第 一章
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权力监督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加强和改进干部权力监督是迎接新世纪挑战的需要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着深远的变化。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都比较有利，我们确实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大好时机。这样的历史机遇并不是很多。我们一定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应该看到，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从内部条件看，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本身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充足的后劲。建国 51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22 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当前和今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1997 年 7 月始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和日本的金融动荡，都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大的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继续保持稳定。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拓展时期，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我们已经连续多年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大多数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自 1999 年起，党中央又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为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做出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适合我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时期实际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心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从外部条件看，我国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总的来说也对我们有利。东西方对抗结束，世界有可能出现比较长的和平时期，特别是我国同邻国的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有利于为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我吸引外来投资和技术。亚太地区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对我也是有利的。”这种对国际形势的总体把握，是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客观依据。第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正在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引发新的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减弱，推迟乃至避免的可能性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力量进行我国的经济建设。第二，西方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矛盾很多。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美苏矛盾消失了，但西方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矛盾却日益突出。这些矛盾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市场的争夺和科技的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日益明显。这就有利于我扩大国际生存的空间，从而迅速发展自己。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世界新的科技革命继续发展，国际间产业结构正经历又一次新的调整和重组。这些都为我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国际上看，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二是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界要人主张打两种战争：一是经济战，二是演变战。其目的是要

消灭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一统天下。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两大挑战：一是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西方打市场经济战；二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条件下，我们善不善于同他们打思想政治战。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经济发展上超过资本主义，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改革开放过程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时期，新旧体制交替，社会变革迅速，对外交往频繁，体制上、制度上、政策上、管理上等各方面的漏洞增多，容易造成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危及党的领导。另外，中国将要加人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开放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削减关税，必然会给国有企业和民族工业带来一定的冲击。面对这些挑战，要求我们不但要加快经济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而且还要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综观国内外形势，当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既有难得的机遇，也有严峻的挑战。新形势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只有从严治党，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这种难得的机遇，迎接严峻的挑战，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加快经济发展，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认为现在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还比较软弱无力，“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要求“对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监督’①.

① 见《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第二节　加强干部权力遏制和最终消除腐败必须强化对干部权力的监督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在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经受住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冲击，经受住了西方“和平演变”，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但是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应该清醒地看到，仍然有一些破坏性的力量在危害我国的社会稳定。新世纪之初，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大于困难。要抓住这个机遇，迅速发展自己，就必须高度重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对稳定问题的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严密防范和打击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为实现新世纪的宏伟目标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新世纪，我国要继续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

目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腐败问题；二是要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和“弱化”；三是要防止“法轮功”等邪教蔓延。而权力腐败可以说是影响我党执政的最大危险。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腐败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毒瘤。近几年来，我党的反腐败工作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正如 2000 年 3 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所言：“离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反腐败的任务仍相当繁重。”2000 年 1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新华社共同组织实施的对 50 位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进行的问卷抽查显示：

腐败是专家眼中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认定这一问题为当今中国第一位问题的专家比例高达 42% 。远远超过其他被列为第一问题的总和。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反腐任重道远。

建国初期，毛泽东批斩共和国第一大贪污案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枪声，在我党差不多敲响了 30 年的警钟，它有效地遏制了党内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改革开放，使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心扉。新鲜空气和苍蝇蚊子一起涌入国门。一些人利欲熏心，不能自持。他们因贪欲膨胀而丧失党性、国格和人格，贪财、贪权、贪名、贪色、贪赃枉法。其中收受贿赂者有之，巧取豪夺者有之，卖官鬻爵者有之，执法犯法者有之，草菅人命者有之，沉湎酒色者有之，渎职作假者有之，想过把瘾就死者有之。有些腐败分子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发展成为“用权换钱、用钱买权”的掌权术，“一切向钱看”成了他们“奋斗”的目标，勤“捞”致富成了他们“革命”的准则。于是贪官污吏们导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丑剧。

自 80 年代以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据《北京观察》 1999 年第 4 期一篇文章报道，四川省 10 年来查处了经济犯罪案 45892件，使 983 名县处级以上的干部落入法网，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8亿多元；海南省近 4 年来受理了 3132 件经济犯罪案，其中 10 万至 100 万元的就有 243 件，100 万元以上的也有 80 件，处理县处级干部 42 人，厅级以上的干部 6人；深圳市仅 1998年 1 年就受理了 6196 件，立案 386 件，其中大案要案 139 件，处分 212 人，挽回经济损失 4.523 亿元。浙江省在 1994—1999 年间，共查处党员干部 396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 817人，地厅级干部 67 人。

从全国来看，1979 年立案仅为 703件，到了 1982 年上升到 2.95 万件， 1986 年又上升到 4.96 万件，1989 年上升到 5.89 万件。到了 90 年代初，每年则以 6位数激增，从 1993 年至 199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的 5年间，全国各级纪检机关共立案 73.1 万件，结案 67万多件，处分 93 万多人，其中县处级干部 2 万余人，地厅级干部 1670余人，省部级领导 78 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259 亿多元。90 年代以来，涉案人数较以前的大幅度增加，犯罪分子的职务级别越来越高。其中，厅局级、省部级干部腐败犯罪的发案率明显增高。

从当前情况看，有些消极腐败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还在一些党政领导机关、政法机关蔓延，中高级党员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失职渎职、买官卖官、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案件时有发生；大案、要案等违纪违法案件上升。主要表现在：

第一，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增多。据统计， 1992 年 10 月至 1999 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989261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070812 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 34066 人，厅局级干部 2782 人，省部级干部 113 人。发案率和涉及领导干部的层次逐年提高。1999 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结案件 130414 件，比上年同期增长 8296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32447人，同比增长 696人，在受处分的人员中县（处）级干部 4092人，地（厅）级干部 327 人，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17 人。

第二，腐败的渗透面在扩大，程度在加深。腐败现象从经济领域和直接管钱管物的部门蔓延到负责审批钱物的机关，从一般行政管理部门蔓延到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要害部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多方面。腐败者的行为也已经不足于个人物质挥霍，而是以聚敛财富、积累个人资本为目的，对利的追求多从实物形态转向货币形态。或利用审批权搞权力或利用掌握的权力炒卖证券、股票、房地产和土地；或将国有资产非法转移，或利用产权制度改革化大公为小公、化小公为私有等。

第三，集体腐败现象增多。腐败活动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行

为，而且还表现为有组织的集团性的活动。如集体公款行贿、组织走私、组织骗税等。中央纪委查处的黑龙江大庆联谊股份有限公司案，违法违纪金额 1094 万元，涉及 76 个单位 179 人。湛江走私案被查处的涉案人员共 331 人，其中公职人员 259 人。而震惊全国的建国以来特大厦门走私案，则更是集体腐败的典型，涉及部门和人员之多、走私数额之巨大，都是绝无仅有的。

第四，顶风作案现象突出。一些领导干部置党纪国法不顾，违纪违法，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可以说到了利令智昏、胆大包天的地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江西任职的短短几年中，受贿金额高达 542 万余元。在任省长助理的后期，平均日受贿近 25 万元。胡长清在开始担任副省长的一段时间内，平均每月受贿达 33 万元，每天受贿 1.1 万，完全堕落成一个疯狂的腐败分子。

第五，涉案人员职务级别越来越高。在腐败案件中，厅局级、省部级干部腐败犯罪的发案率明显增高。较为典型的如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阎建宏、湖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张德元、湖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黄伟如、投资银行湖南分行原行长戴天敏、交通银行苏州分行总经理蔡涵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原总经理周华孚、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欧阳德、于飞、国家科委原副主任李效时、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北京市原书记陈希同、副市长王宝森、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等等，这些高官均因腐败纷纷落网，受到法律制裁，其中有些人还判处极刑。

第六，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在 80 年代，腐败分子若贪污受贿几十万元绝对是全国的大案，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分子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数额急剧增长，几十万元的案件屡见不鲜，上百万的案件频频发生，几百万、几千万的案件也时见披露，甚至上亿元的案件也不足为奇。

第七，“59 岁现象”。从大量权力腐败案件中可以看出，有一大批干部是临近退休时走上犯罪道路的，这种在退休前抓紧捞一把的现象，被称之为“ 59 岁现象”。这些人多数有光荣的历史，曾为人民做过不少工作，但在步入老年，即将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有的存在“付出太多，得到太少”的心理；有的存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有的疏于小节、心怀侥幸；有的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为自己抢留后路；有的对那些暴发户所拥有的一切忿忿不平；有的对在职和退位后实际地位的巨大反差使他们看不到前途。正是这种心理失衡。使一些人一反常态，开始利用自己所拥有权力的最后一段时间来尽可能地多捞钱。钱捞得多了，他们心里的失衡感才减轻一些，对未来的安全感才增加一些。结果，在站最后一班岗时，使自己身败名裂，大半辈子的奋斗毁于一旦。这便是某些“黄昏犯罪”者从思想上的最初癌变到全身扩散的重要过程。据某直辖市纪检部门提出的数字证实，该市近年查处的局级干部中，59 岁上下坠入犯罪泥坑的占到了 2/3。省部级干部中也有一些是临近退下来或已经退居二线以后，因经济违法违纪而受到查处。据统计，江苏省 1995 年处分的 122 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 50 岁以上的就 80 名，占犯罪错干部总数的 66%，其他省的情况也与江苏类似。因此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八次全会上指出：“有的人表现一贯是好的，快要离退休了，有的甚至 59 岁半了，本来可以功成名就，可以很好地度过幸福的晚年生活，却最后搞得自己身败名裂。”

第八，“一把手”现象。某新闻媒体在 1998 年列出一个“共和国贪官排行榜”，让人们感到震惊，在 40多个被枪决和判刑的县处级以上贪官中，“一把手”竟占 85% 以上，即使那些“副职”，如果深入调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们“出问题”时，十有八九都在“一把手”的位置上。这是一个人们不愿看到的现象，然而，它却是一个事实，这种可怕的事实，被人们称之为“一把

手”现象。

这里所说的“一把手”有两种涵义：一是指一个单位或部门中的真正的“第一把手”，如陈希同、胡建学之类；二是虽然不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但是，却是很有权势的真正“实权派”，如王宝森之流，虽非北京市的“第一把手”，但是在其所管的部门中所具有的权力来说，也可以说是“第一把手”。近年来，我们在干部队伍的管理上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上，仍然是个薄弱环节。目前，有的“一把手”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民主意识差，搞“家长制”，独断专行，特权意识浓厚；在财务管理上，乱开支现象较为严重；在工作作风上，搞形式主义，虚报政绩，做表面文章，欺上瞒下；淡忘宗旨，利用权力挥霍公款，追求享受；“傍大款”,赶时髦、见利忘义。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把手”出问题、出大问题，已经是一个见怪不怪的问题了。那些出问题的往往是市长、书记、厅长、县长、董事长、总经理之类，有的甚至在一个岗位上，连着几任“一把手”都出问题已经屡见不鲜。这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实事。

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因此，解决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尤其是中央领导层的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不解决，反腐败斗争就无法深入，党的执政地位就无法巩固，人民群众就会失去对党的信任。

第九，司法腐败现象。近年来，在政法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索贿受贿、吃拿卡要、欺凌百姓，纵欲淫乐和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腐败现象，司法腐败已经突破了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以致一段时间有些人对司法公正失去信心，有案不报，有

状不诉，而是采取非法手段或寻找黑社会力量来解决问题，使法律的尊严、司法机关的威信，政法队伍的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司法腐败的严峻形势迫使政法机关不得不于 1998 年初春展开声势浩大的教育、整顿、惩治司法腐败的专项治理活动，并启动以审判与检务公开为内容的“阳光工程”。90 年代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司法最为腐败的时期，一些轰动全国的司法腐败案件频频曝光，如湖南益阳市原政法委书记齐湘慧受贿案，南昌市原政法委书记曾新民腐败案，广东化州市原政法委书记曾胜受贿案，广东惠州市原公安局长洪永林腐败案，广西隆安县原公安局长陆世长腐败案，贵州省公安厅原厅长郭政民受贿案，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受贿案等。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毁坏了法律—— 好比污染了水源”。近年来，由于政法队伍中出现了少数害群之马，玷污了共和国神圣的国徽，损害了人民群众心目中政法机关的光辉形象。

第十，工程腐败现象。目前，我国正处于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基本建设是一个重要经济热点，投资规模一直比较大。对某些基建中的腐败，群众中有这样的说法，“楼房盖起来，干部倒下去”，“工程完了，干部也完了。”据统计，近几年查处的数十万件贿赂案件中，涉及建筑业的竟占 63%。

当然，以上列举的种种腐败现象，并不一定全部涵盖当今腐败的最新动向。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以上列举的腐败分子毕竟只是我国广大领导干部中的少数害群之马。正如江泽民总书记 2000 年 1 月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所指出的：“从总体上说，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这是流，是基本的方面。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有害的。”事实上，像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廉洁奉公的干部仍然在各地不断涌

现。我们决不能因为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而否定党的领导；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而放松反腐败的斗争。

腐败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陷阱，对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危害。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价值观的急剧变化必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伴随着种种矛盾冲突，如新的财富和权力资源的形成，社会阶层相对地位的变化，贫富差距扩大，法律体系的不适应，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客观上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体系组织社会力量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缓和社会冲突；而腐败现象却冲击着政治体系的运作，致使社会矛盾更进一步激化。

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严重影响政府的权威，危害社会的政治稳定。它不仅损耗政府的效能，造成公共管理的混乱，破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国家资财的流失，而且践踏法制和道德，致使公众法律信念淡漠和社会道德水准下降。腐败是社会的罪恶，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构成了极大的危害。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要发展的东西，腐败却给破坏了。发展中国家最需要发展民主与法制，最需要政府的高效，最需要政治稳定，最需要国家财力的强盛，最需要建立公平竞争秩序，最需要经济协调有序的发展，最需要财富的公平分配，最需国家公务员的优化，最需要公民的互相协作精神，最需要全民族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可是腐败却从中作梗。在这种形势下，必然延缓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严重腐败的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衰弱的表现，是一个国家经济不发达的表现，是一个国家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的表现。结论只能是：要想发展，要想实现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现代化，必须削平腐败高峰、控制腐败势头，进而基本消除腐败。反腐败最基本的措施就是建立权力监督机制，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用权力制约权力。可以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遏制腐败是权力监督的基本使命。

分析表明，腐败只会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而不可能成为什么“润滑剂”，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把曾经有过腐败猖獗的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今日经济的繁荣，归结为政府当局卓有成效的反腐败努力所创造的廉洁高效的行政；已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把通过反腐败创造一个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举措。所有的人，都应当丢掉反腐败会妨碍改革开放、影响经济发展的观念。中国反腐败绝不能手软。

应该说，我们的今天是值得自豪的，经过所有共产党人和一切志士仁人的牺牲奋斗，我们已经建成了拥有 6000 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和占世界人口近 1/4 的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显然，任何外部的侵略都不可能征服我们。

有位香港人士评论说：“如果说有什么能毁掉中国大陆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话，那就是腐败。”

有位国内民主党派的人士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谁能打倒共产党？谁也不能打倒共产党！只有共产党内部腐败，才能不打自倒！”这些话听着刺耳，然而，一切清醒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能不承认，他们说得切中要害。

第三节　加强权力监督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权力监督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保证

江泽民同志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精辟总结了我们党近 80 年来的基本经验，

科学地概括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深刻地指明了新形势下坚持党的先进性和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的努力方向。因此，要保持党的先进性，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而从严治党的核心就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三个代表”是对新时期党的先进性的新概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实际，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探索，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邓小平明确指出：新时期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创造性地推进了这个伟大工程，不断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努力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同邓小平提出的“两个成为”和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一脉相承的，是党的先进性的科学概括。它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 21 世纪，我们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我们党面向新世纪进一步巩固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只要我们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做好各项工作，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就一定能够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

（一）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必须加强权力监督

这是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和集中体现。生产力是推动人类

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谁推动生产力发展，谁就是这个社会最先进的力量；谁阻碍生产力发展，谁就是这个社会的衰朽势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最先进的社会力量，就是因为它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为标志，人类社会生产力形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今天突出强调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是适应时代的需要，适应党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和基本路线的需要。面对新世纪，我们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一方面，要敏锐地了解和把握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的最新动向和发展趋势，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认真研究和解决生产力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特别要高度重视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掌握发展和竞争的主动权。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并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环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为生产的发展指明方向、开辟道路、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党必须按照“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原则，充分发挥对社会的整合作用和功能，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

调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按照各自的职责，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综上所述，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要求，首先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始终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始终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者，而不是阻碍者。苏联共产党被人民抛弃的历史悲剧，就在于它由原来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者，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者。这个前车之鉴，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二）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加强权力监督

这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党自身发展、巩固和成熟的基本条件。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为其服务。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阶级和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自它创建以来，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是我们党领导、组织和推动的。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看到，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各种思想文化的较量日趋激烈，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这是先进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保证。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发展必须走向多

样化，这既是一种社会进步，又带来许多复杂的问题。当前在我国，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还存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还存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会不时地反映出来。比如，有的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否定我们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有的鼓吹西方的民主、自由，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的主张私有化，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的宣扬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文化市场中的黄色制品和非法出版物屡禁不止，等等。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影响我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列宁说过：“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只是由于它同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进行不断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因此，要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宣传和推广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我们提倡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提倡吸收借鉴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但是，我们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决不能违背社会主义原则。

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认真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在干部队伍中深入进行从政道德教育，构建社会主义从政道德体系，把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上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道德观，筑起不倒的精神长城。

（三）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加强

权力监督

这是党的先进性的最本质的体现。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工人阶级政党。我们致力于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致力于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指出，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我们党诞生 80 年之所以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之所以能在艰苦、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信任、拥护和支持。这是我们党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现在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正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考验。而党经受起这种新考验的力量源泉依然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面对新世纪，我们是不是、能不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问题。如果作为执政党不能很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甚至违背他们的利益，就会失去执政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根据执政党的历史经验，要更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继续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执政党必须有执政的能力和水平。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把管理国家的权力赋予我们党，党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把人民的权力行使好，把人民委托我们的事业办好。这就要求我们党有治党治国治军治吏的本领，有落实“三个代表”的能力，这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所以，十五大把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要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就要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